

THE
Twentieth
Century

2



- 暧昧日本的清醒者大江健三郎
- 现代小说艺术开拓者卡夫卡
- 孤独的叛逆者詹姆斯·乔伊斯
- 追忆逝水年华的巨匠普鲁斯特
- 魔幻现实主义大师马尔克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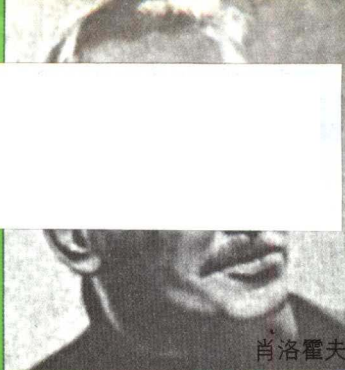
冯羽 夏秀玫 主编

二十世纪

大文学家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


肖洛霍夫

领衔撰稿

董衡巽 叶渭渠
孙坤荣 徐知免
林秀清 石国雄
王中忱 陈建华



川端康成



纳博科夫



弗吉尼亚·伍尔夫

二十世纪 大文学家

冯羽 夏秀玫 主编

江苏文艺出版社



泰戈尔



大江健三郎

K85.6

二十世纪大文学家

主 编:冯羽 夏秀玫
责任编辑:汪修荣

出版发行:江苏文艺出版社(邮政编码:210009)
经 销:江苏省新华书店
印 刷 者:扬州印刷总厂

850×1168毫米 1/32 印张 9.75 插页 2
字数 200,000 1996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
印数:1—10300册

标准书号:ISBN 7—5399—1055—0/I·996
定 价:13.00元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目 录

暧昧日本的清醒者——大江健三郎	1
-----------------	---

山村少年——日本投降——立志创作——萨特的影响——
畸形儿的诞生——“个人的体验”——作家的良知

魔幻现实主义大师——加西亚·马尔克斯	15
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

父母·家庭——在外祖父家度过的童年——到首都去上学
——辍学当记者——欧洲漫游——为拉美社工作——写作《百
年孤独》——避居巴塞罗那——诺贝尔文学奖

俄罗斯道义的保管者——索尔仁尼琴	36
------------------	----

多舛的命运——一举成名——冲突·流亡——“索尔仁尼
琴回归”热

撰写“天书”的人——克洛德·西蒙	49
------------------	----

一心想当画家——西班牙内战——逃出俘虏营——新小说
的诞生——转折点——一举成名——壮心不已——荣誉的顶峰

世界文坛的“局外人”——加缪	64
----------------	----

饱经忧患的青春岁月——历经坎坷的记者生涯——荒诞的证明——告别荒诞的人世

书斋里的骑士——萨特 78

乖戾的童年——我就是洛根丁——俄瑞斯特斯的道路——后工业社会的骑士——我将在希望中死去

顿河草原上的雄鹰——肖洛霍夫 92

顿河草原上的童年——爱上文学——哥萨克暴动——粮食监察员——“青年近卫军”——“鲜花一样”的小说——剽窃风波——斯大林的裁决——诺贝尔文学奖

美洲大陆的歌手——巴勃罗·聂鲁达 109

一个拓荒者——一举成名——东方外交官——西班牙内战——叛逆者——营救西班牙人——流亡——凯旋归来

文坛硬汉子——海明威 120

在印第安部落——“迷惘的一代”——永别了，武器——“硬汉子”精神——非洲狩猎——“最最优秀的单篇作品”

表现日本人心灵的大师——川端康成 132

一个孤儿——创作天赋——“十二秀才”——“最有前途的人”——新感觉派集团中的异端分子——诺贝尔文学奖

一个有争议的世界级作家——纳博科夫 144

俄罗斯岁月——从俄罗斯到欧罗巴——执教生涯——“《洛丽塔》使我名扬天下”——永恒的俄罗斯情结

在邮票般大小的地方创造奇迹的作家——福克纳 157

“老上校”的影响——妈妈的孩子——“游手好闲的流浪汉”——我从未喜欢过学校——“战争英雄”——最糟糕的邮电所长——为好莱坞写作——我是美国最好的作家

苏联文坛的“日瓦戈”——帕斯捷尔纳克 175

初见托尔斯泰——意外事故——为托尔斯泰送葬——诗坛新秀——政治风云——轰动世界的畅销书——“日瓦戈热”——帕斯捷尔纳克事件——销声匿迹

现代小说艺术的开拓者——卡夫卡 186

孤独的生活——无望的爱情——谜样的小说

孤独的叛逆者——詹姆斯·乔伊斯 204

锋芒初现——屡遭退稿的《都柏林人》——四处流离——艺术的极致——墙外开花——一部天书——石破天惊——禁书难禁

意识流小说的“皇后”——弗吉尼亚·伍尔夫 219

一个大家庭——父母双亡——祸不单行——沙龙皇后——布鲁姆斯伯里集团——“毕生最为明智的决定”——永恒的瞬间

追忆逝水年华的巨匠——普鲁斯特 229

富有的童年——爱上文学——出入沙龙——创作准备——最亲爱的人死了——闭门著书——不朽的名著

小说艺术的“魔山”——托马斯·曼 242

初试锋芒——资产阶级艺术家——一次大战兄弟阋墙——
“魔山”上的反思与醒悟——为犹太人仗义执言——“痛苦之
书”——宽恕、容忍和同情——引发世人争议的大师

暴风雨中的海燕——高尔基 260

“在人间”——“我的大学”——“你以为我可以写作
吗？”——时代的海燕——流亡——分歧——重返祖国

神秘的东方诗圣——泰戈尔 275

名门望族——童年时代——诗的觉醒——多方面收获——
爱国情深——享誉世界——崇高的友谊——最后的歌

戏剧幽默大师——肖伯纳 290

一个母亲和三个父亲——谋生与从政——令人不快的戏剧
——食与性——令人愉快的戏剧——比莎士比亚还要好？

编后记 307

暧昧日本的清醒者

——大江健三郎

山村少年——日本投降——立志创作——萨特的影响——
畸形儿的诞生——“个人的体验”——作家的良知

1935年1月31日，大江健三郎出生于日本的爱媛县喜多郡大濑村。爱媛县位于偏离日本本州的四国岛上，县内多山，大濑村就藏在丛山峻岭里。村子的四周是遮天蔽日的森林，村子下面的山谷有河水流过，自然风光是美丽的，交通却极其不便。但文化的流传有时很奇妙，若干年以后，大江健三郎发现，自己的故乡，这几近与世隔绝的山村，一些风习竟似乎和遥远的中国的南方乡镇有某种联系。那时，大江健三郎恰巧读到鲁迅的作品《父亲的病》。当鲁迅积病多年的父亲濒临病危的时候，一位同族亲戚要他用力地在父亲的耳边呼唤，他照样做了，他看到父亲平静的脸紧张起来，痛苦地睁开眼睛，断续地喘着气，叫他不要吵。但他还是呼喊，直到父亲咽气。长大成人以后，鲁迅仿佛常常能听到父亲那断续的声音，对自己当时的行为深悔不已。这段情节令大江健三郎震动，他想起自己不幸的童年，想

起自己父亲的死。事情竟然如此相似，姐姐、弟弟、妹妹围住奄奄一息的父亲，也是那样按大人们的要求使劲叫喊，唯独他自己拒绝这样做。那时候，站在旁边的母亲用谴责的目光看着自己。那眼神，深深刻在他的记忆里，永久不能磨灭。鲁迅的作品，在大江健三郎的意识深层掀起波澜，他觉得，有必要反躬重审，面对社会、世界乃至宇宙，为当年拒绝在濒危的父亲耳边叫喊的少年做出解释。他把自己的这段经验写进了长篇小说《迟到的青年》（1961）里。

父亲病逝那年，大江健三郎9岁，正在村里的国民学校读书。国民学校，本来就是小学校，1941年，日本政府在发动太平洋战争之时下令改变称呼，用意很明显，是要强化国内的军国主义思想统治。大江健三郎恰巧就是那年入的学，国民学校的气氛压抑而恐怖，教师经常向小学生发问：如果天皇要你去死，你怎么办？小学生必须回答：我就去死，剖腹自杀！尽管这样回答的时候，孩子们常常脸色苍白，四肢发抖。如果谁回答得慢了，就会遭到教师的拳打脚踢。学校的奉安殿里悬挂着天皇的肖像，少年健三郎虽然不无好奇，却从来没敢直视一眼。

但是，如果读一读健三郎国民学校时候的作文，那里面呈现的却完全是另一番风景，完全是充溢着幸福感的暖色：“麦田刚刚发青，我走在田间小路上，温煦的春风轻轻抚摸着我的头，微微拂过。我边走边想：和那些出生在外国的人比，生长在强大的日本国的我们实在太荣幸了。”军国主义的思想教育，就这样，通过各种途径，向幼小的心灵灌输。

1945年8月15日，日本昭和天皇发表广播讲话，宣布战败投降，日本的现代历史发生转变。当天皇声音通过电波传到大濑村时，年仅10岁的大江健三郎还不能理解这一事件的意义，他站在庭院的强烈阳光里，奇怪地向光线暗淡的屋内张望，大人都站在收音机前痛哭。他不解原由，无聊地看了一会，便跑到村路上去找小伙伴。村路上只有孩子们，没谁能说清究竟

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但大家都确实听到了天皇的声音，竟然是和普通人一样的声音。这让孩子们感到意外，奇怪，同时也感到特别有趣。一个年纪较小的孩子，竟摹仿起天皇的腔调，摹仿得维妙维肖，惹起一阵哄笑。孩子们的笑声在沉闷的山村荡起小小的回响，消失在晴朗空旷的上空。但笑声很快停止，孩子们互相看着，陷入沉默。一种莫名的恐惧，仿佛从那高空盘旋而下。不必说，对天皇的畏惧，还浓重地笼罩着他们幼小的心灵。孩子们怀着不安的心情四散走开，但健三郎没有回家，他沿着河边向前走，走到一个被岩石和竹丛遮掩的河岔，在岸边的竹丛脱光衣服，然后把身子浸到水里。河水特别温暖，河底的粘土特别柔软，健三郎抬头仰望天空，夏日的正午，阳光灿烂。他感到一种奇妙的轻松，自由，同时伴随着一种担忧：从此以后，我没有为天皇效力战死战场的机会了吧？但在他的心里，马上又发出这样的声音：如果这样，那倒挺好。对国民学校的实际厌恶感，与学校灌输的意识形态，在健三郎内心交战。后来他回忆说，生的喜悦，尽管与战死战场的英雄理想相比平常而平庸，但最终还是在他心里占了上风。

不久，美国占领军开了进来，山区的人们开始切切实实感受到时代的变化。占领军来到大濑村之前，国民学校的教头（副校长）把全校学生召集起来，教他们喊“哈喽”，说是准备欢迎占领军。大江后来戏称这是他最初的英语课。最让他感到不解的是那位站在讲台上的教头，他本来喊为天皇而死喊得最凶，现在喊“哈喽”居然也同样卖力。过了几天，占领军的吉普车沿河边开了过来，教头带着学生在村口列队欢迎，健三郎却从教室的后窗口悄悄爬走，躲到村边的森林里。他不肯参加“哈喽”合唱，他开始用自己的眼睛观察战后的现实。

战后的日本，在国际进步力量、特别是美国占领军的监督 and 指导下，开始进行民主主义的改革，公布了新的宪法。学校的教育制度也发生了变化，国民学校的名称被废除，学制从小

学到高中改为六三三制；1947年，大濑村成立新学制的中学，大江健三郎是该校的首届学生。新学制中学与国民学校大为不同，校内充溢着新鲜自由的气氛。原来的修身课改为宪法课，教科书是上下两册的《民主主义》。战败后的时代，日本的经济陷入极端困难的状态，学校教科书的印刷质量特别糟糕，并且需要学生们自己裁开装订，但《民主主义》却是印装得整整齐齐的两册厚书，因此特别让孩子们珍惜。书的数量不多，不能人手一册，孩子们都想得到，于是就抽签，抽中的喜出望外，没抽中的则痛哭流涕。这情景，大江健三郎记得很深，后来多次在文章里谈到。而他最感兴趣记得最深的，当然是书里的内容，特别是新宪法中放弃战争和主权在民的思想。这是对军国主义侵略战争和天皇专制制度的否定，是战后民主主义的根本。对大江来说，新宪法这两条主干内容，并不只是抽象的思想，而是活生生的存在。耳闻目睹的战争惨祸，使他深切体会到放弃战争这一誓言般的宪法条文的意义，而主权在民思想，则使他从天皇专制的恐怖中获得解放，启发他从自己主体内部确立自我的主权。

后来，日本一些右派，曾多次举行要求改宪的活动。其中的一条理由是，战后宪法是美国占领军强加给日本的。大江健三郎始终是护宪派，他说：战后宪法的起草以及颁布过程，对于战后成长起来的人来说，并没有多大意义，问题的关键是，我确实是通过自己的体验和思考，自主接受战后新宪法的，我少年时代的激情，后来的成长，人格标准和道德感觉的形成，都与宪法密切相关。宪法的根本内容，就是我现实生存中最基本的道德伦理准则。1994年，在斯德哥尔摩，大江健三郎作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发表演说时，还用了相当的篇幅，批评日本国内和国际上一些企图修改战后宪法的论调。有的研究者认为，从大江作品的文体，可以看出战后宪法欧化文法的影响。这自然需要更细致的分析，不过，战后宪法与大江的思维感觉血肉相

联，应该是有疑问的。

但在现实生活中，战后宪法确实不断被扭曲。特别是朝鲜战争爆发以后，世界冷战格局开始形成，日本政府明显右转。上高中一年级的時候，大江健三郎从报纸上读到共产党领导人被驱逐的消息，他感到，战后以来民主自由的明朗氛围消失了。与此同时，日本政府违背放弃战争的誓言的动向也越来越明显，先是组建保安队，然后改为警察预备队，而到了1954年，则正式组建自卫队，重建军备行为从隐蔽走向公开。1953年，大江健三郎高中毕业，他到东京进预备学校，准备去投考大学。第一次离开故乡，他和几位同学结伴而行。那几位同学准备报考的大学，其实就是军官学校。火车到达东京郊外的车站，大江和同学分手时，内心十分沉重。他感到，这是人生歧路上的告别。

二

1954年，大江健三郎考入东京大学文科。头两年，学习共同基础课，然后进入法国文学科。这里的文学气氛很浓，日本的许多著名作家、文学理论家都出自这个专业。大江学习专业课程的时候，法国文学科的主任教授是渡边一夫博士。他是一位学识渊博的人文主义者，青年时期留学法国，专攻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，特别是拉伯雷的创作。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以后，他始终站在人道的立场，以迂回的笔法，批判狂热的军国主义思潮。对战后的一代青年人来说，渡边一夫的人格和文章充满魅力。还在读高中的时候，大江健三郎就读过渡边先生的著作《法国文艺复兴断章》，那时，他就决心将来要考到东京大学去，向渡边先生学习。进东大后第三年，这机会终于来了。大江记得，那是四月的一天，银杏树刚刚发出新芽，渡边一夫先生来为他们讲中世纪法语语法。课程的内容很专，但教室里却挤满了学生。好多人都和大江一样，早就是渡边先生的热心读者。大

江后来说，中世纪法语语法学完后虽然没有派上什么用场，但几乎就在听渡边先生的第一节课上，他觉得，自己的人生方向已经确定了。

大江健三郎尊称渡边一夫是自己终生的老师。渡边教授也特别看重这位学生，但他并没有鼓励大江跟随自己从事学术研究。作为一位优秀的教育家，渡边先生很尊重学生的个性，鼓励学生按自己的性情发展。大江的兴趣和特长主要在文学创作，进入大学不久，他就开始为学生剧团写剧本，在学校的报纸上发表小说。1957年5月，他的短篇小说《奇妙的工作》获得东京大学五月祭文学奖，并引起了著名评论家平野谦的注意，由于平野的评介，文坛开始关注这位文学新人，几个有影响的杂志陆续刊出大江的新作，其中，刊载在《文学界》1957年8月号上的短篇小说《死者的奢华》，成为当年度芥川文学奖的候选作品。次年，大江的中篇小说《饲养》几乎无争议地获得了第39届芥川文学奖。年仅23岁的在校学生大江健三郎获得芥川奖，也就基本确定了自己的人生路向，他专心致志地投入创作，而没有像其他的同学那样去操心毕业后的工作问题。获奖当年，他连续出版了《死者的奢华》等两部小说集和长篇《拔芽击崽》。

作为一个外国文学专业的学生，大江自然有机会广泛接触世界文学。在学校里，他跟着教授学习法国古典文学，而回到住处，则主要阅读20世纪现代主义作家的作品，如萨特、加缪、福克纳、梅勒、索尔·贝娄等，他对萨特的作品极其迷恋，有一阶段，几乎手不释卷。他后来回忆说：“学校放假的时候，我就像专舔自己掌上盐粒的冬眠的熊似的，从早到晚，舔着萨特掌上的盐粒度日。只有假期快结束的那一周，我才从萨特的泥沼里抬起头，尝试用自己的声音唱一首歌。”

萨特的思想、行为，特别是介入社会的态度对大江健三郎的影响，也许要超过他的文学作品。大江本来身体文弱，性格

内向，喜欢独处冥想，但开始作家生活后，他有意识地改变自己，尽量开阔视野，积极介入现实生活。1959年，他接受电视台的邀请，到日本北方的礼文岛采访，写纪实性作品，就是出于这一目的。他说：“我认为，在现代新闻媒体的社会里，作为一个纯文学的小说家的社会作用，只能获得很小的评价，这之中，唯一可能引起关注的，就是纪实文学的写作。”（《严峻的钢丝表演·第5辑前记》）后来，大江的主业当然始终是虚构性的小说创作，但也一直坚持调查采访活动，不时有纪实作品问世。

1959年3月，大江健三郎大学毕业，成为职业作家。他没有把自己关在书斋，而是主动把目光投向社会，他感受到了社会变动的潮涌波动。其时，正值全国上下讨论日美安全保障条约修改的问题，进步人士和青年学生反对日本在冷战格局中继续向右倾斜，发起阻止改约运动，大江也积极投身其间。1960年5月，以岸信介为首的自民党无视国民意见，强行通过改约议案，激起大规模的抗议运动。大江也参加游行，并发表《民主主义的愤怒》等文章，批判政府的暴行。

这一时期，大江也开始关心国际性问题。1960年5月，他参加日本第3次访中文学代表团，到中国访问。那时，日中两国还没有建交，日本政府极其主动地参与冷战对峙，顽固地把新兴的社会主义中国视为敌手，在这种情势下，大江等文学家访华，是很需要勇气的。大江对新中国的印象很好。

大江的中国之行自然不会都是错觉，他访问了日本侵华战争的受害者，促使他从另一个视点审视那场战争；而重审历史的时候，大江仍密切关注着日本社会的现实。他把对历史与真实的感受都写进了小说《迟到的青年》。这部长篇由两部构成：第一部的故事在一个森林里的小村庄展开，主要刻画一位山村少年在日本战败前后的精神状态；第二部则描绘这位山村青年进入大城市的经历与感受。这部成长小说浸染着作家个人经验

的浓重色彩，大江自称是“虚构的自传”，同时他又说，这部作品的拟想读者是60年代的青年（《迟到的青年·后记》）。

《迟到的青年》于1960年9月在《新潮》杂志开始连载，到次年2月载完。正当他紧张的写作中，一个重大事件发生，日本左翼进步政党社会党浅沼委员长被暗杀，大江震惊而愤怒，他很快发表了小说《政治少年之死》（1961年2月），隐喻式地表现了这一事件。日本右翼集团立刻采取威胁恫吓等手段，对作家和刊载该作品的《文学界》杂志施加压力。最后，《文学界》未征求大江意见，发表谢罪声明，事情才算告一段落。大江抗议，但引不起反响，后来，几次出版小说集，《政治少年之死》都被出版社拒之集外。这让大江切身体验了所谓自由民主国家的言论自由限度。

1961年夏末，大江应保加利亚作家协会的邀请，赴欧洲旅行。冬季到了法国，在巴黎，他挤进学生游行的队伍，见到了他崇敬的萨特，后来，又单独采访了萨特。面对自己思想与文学的守护神般的人物，大江有些紧张，当萨特知道他毕业于东京大学法文系，便问他：你主要读了谁的作品？大江竟不好意思说是萨特本人，而是嗫嚅地说出了拉辛的名字。腼腆是山村出身的大江的天性，固执也同样是他性格的主要成分。他用自己的目光打量萨特，以平等的对话态度向这位举世知名的作家提问题。永远对青年寄予厚望的萨特热情地接待了大江，回答了他的提问。当晚，大江独自走在巴黎街头，走过萨特的住地。萨特已乘晚车去了罗马，窗口漆黑。大江感谢萨特在百忙中接受采访，同时内心也有一种很深的怅惘。他不无感慨地想：萨特已经开始衰老了。从开始创作到现在，大江一直处于文学与政治的潮头上，他在两者的张力中获得激情，有时也为两者的矛盾困惑不已。这次欧洲之旅，他是怀着热望奔到巴黎的，然而，萨特并没有解决他的精神困境。大江穿过街巷，走进一家酒店。第二天，他带着困惑和疑虑登上飞机，放眼望去，一片

荒凉。他感到这次旅行太漫长了。

回国后，大江参加了一些讨论安保斗争的集会。与学者、理论家们不同，大江并不太热衷评价斗争的胜败，他主要关心的是这场斗争在人们的现实生活中留下的影响和痕迹。市民和学生在斗争中的英勇行为，很令大江感动；但他知道，斗争不会以运动的方式继续发展，生活将恢复平静。他很遗憾地写道，即使是严谨缜密的萨特，对日本学生运动的评价和预测，也是失言。“他那优雅的声音相当脱离现实”。当然，安保斗争的影响，也不会因右翼政府的强压而消失，大江想起明治时期的优秀诗人石川啄木的名言，石川感慨社会浑浊，激愤地说：我们日本的青年人，迄今为止，还不曾和强权势力发生争执。大江说，五十年后的今天，可以说，无论如何，我们日本青年已经和强权势力发生了争执；“与强权争执的精神，是我的文学所关心的最本质的主题”（《与强权争执的精神》）。

不过，作为一个文学家，大江没有单纯从政治角度观察人和社会，这一时期，他关心的重点还有性的问题。1959年，大江创作《我们的时代》，直接涉笔性意识；安保斗争游行示威的高潮中，一个男子在电车调戏青年姑娘的消息，引起大江格外注意。他想，对于那个男子来说，政治斗争，社会问题，都不足挂怀，唯有女性，占据他整个意识。这样的人，可以称为“性的人”吧，文学上应该怎样表现这些“性的人”呢？大江写了《现代文学与性》等文章，进行理论探讨，他特别推重美国作家梅勒的话：20世纪后半留给文学冒险家的未开地，只有性。1963年，大江出版了系列小说汇集《性的人》。大江认为，以性为题材的文学，大体可分为两类，一类是古典或拟古典作品，把用隐喻的语言，暗示的方法，描绘与性相关的意象，表现性的美；大江把这类作品称为性爱文学，而把自己的作品称为性文学。按他的说法，性文学是反古典的，直接赤裸裸地描写性本身。大江说：我在表现性的时候，总是频繁使用具体而直接的

词语，甚或可以说到了滥用的程度。读读《性的人》等作品，可知他说的不夸张。大江并不认为性是有美的价值的存在，而是把性当作一种“反存在”因素，他企望通过赤裸裸的性描写，使读者受到刺激、震撼，在平淡的昏昏然的日常生活中清醒过来，从而发现人的意识深层的异常。性是他构成作品的方法，而不是目的。（参见《〈我们的时代〉与我》）即使是性文学，大江的作品也仍然是外向地介入社会型的。从文学影响的角度看，这类创作，可以说是萨特和梅勒的影响混合。

三

1960年春，大江健三郎和伊丹缘结婚。伊丹缘的父亲是著名电影导演伊丹万作，哥哥伊丹十三与大江是中学同学，且是好友，后来也成了导演。大江的恋爱是在充满艺术氛围的环境中进行的，结婚的前一天，他坐着电车，跑了好远的路，为新娘买了一束兰花。

当天傍晚，大江坐在一家茶馆里，望着窗外暮色里的风景，一个人发呆。自从读高中二年级起，他一直独自过寄宿生活，孤独几乎成了他生活的必须。那年随电视台去礼文岛采访，最让他难以忍耐的是没有单独活动的机会。后来，他要求离开团体，一个人在一个房间里关了三天；他锁上门，在屋内爬着学熊叫。三天后归队，一切恢复正常。但如果没有三天的独处，他可能会发疯。结婚后，一天二十四小时，身旁都有一个他者存在，会怎么样呢？大江想了许多，由具体到抽象，由教堂里的结婚仪式想到葬礼仪式，“对于无宗教信仰的日本人来说，与宗教发生关系的行动，一般只有结婚和死这两次机会，”而这两者所呈现出的意象，不确实是常常重合吗？或者说，“结婚是生和死连接点上最显眼的地方，最显眼的时刻”。（《结婚与死》）